



这个人拥有这么大的能量的秘密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他以使徒身份到日本贫民窟？他进行了怎样的布道，让他的到来在东方和西方都成为一件盛事？

賀川豊彦

贺川丰彦

爱与社会正义的使徒

〔美〕罗伯特·施尔德根 著

刘家峰 刘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贺川丰彦

爱与社会主义的使徒

[美] 罗伯特·施尔德根 著

刘家峰 刘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贺川丰彦：爱与社会正义的使徒/（美）施尔德根著；
刘家峰，刘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01-06276-1

I. 贺… II. ①施… ②刘… ③刘… III. 贺川丰彦—传记
IV. B979.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2009）第12538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9-102号

本书经作者Robert Schildgen（罗伯特·施尔德根）授权出版中文
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6印张 2插页

字数：300千字

定 价：32.00元

致中国读者

我非常高兴罗伯特·施尔德根(Robert Schildgen)的大著——《贺川丰彦：爱与社会正义的使徒》中文版问世，在此，特别感谢刘家峰博士与刘莉女士的辛勤劳动。贺川丰彦(1888—1960)，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领域，如工会运动、农会运动、和平运动、合作运动和基督教布道运动中都是强有力的先驱人物。

虽然现今只有少数日本人记得贺川曾为之无私奉献的工作，但他播下的许多种子如今都已成长起来，他的梦想今天在日本都已成为现实。日本变成了一个富裕、民主的国家。然而，当今日本社会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问题，诸如日益加大的贫富悬殊、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以及思想和灵性的冲突等等。1909年，贺川21岁时入住贫民窟，从那以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思想和社会改革计划，以帮助穷人和革新社会，让那些被压制的人得解放。2009年是贺川入住贫民窟一百周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应该牢记和复兴贺川的思想和生活，我们正努力筹划这一百周年的庆典活动，以兹纪念贺川。

贺川是一生都在强烈呼吁世界和平、尽职尽责的少数日本知识分子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时候。他也是自日军侵略中国后公开向中国人民致歉的少数日本知识分子领袖之一。然而，恰好像贺川这样的人，却不能够充分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所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真正目的。了解历史、共同努力创造和建构一个全新的和平的国际社会，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尽的责任。

加山久夫
贺川丰彦档案与资料中心主任
明治学院大学荣休教授
2008年2月

中文版序

贺川丰彦很早就致力于和平运动，以他的言行证明如何反对由贫穷、种族与宗教歧视、法西斯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僵化所产生的暴力。正是他这种牺牲自我来帮助日本穷人的努力，率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贺川访问了许多国家，向全世界呼吁友爱、和平、公正与合作运动。

1904年，贺川还是个青春少年，他就被基督教的理念“凡拿剑的人都会死在剑下”所激发，当时，他抗议日本对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冒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拒绝参加军事演练，也因此遭到踢打。虽然有57000多日本人和31000多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但这仅是后来一场更大的流血战争的开始，他的国家在随后多年中进一步军事化，并对外侵略，因此酿成了更大的苦果。

贺川知道，日本醉心于军国主义和暴力的根源在于它在1895年中日战争中获胜。日本向侵略国的转变在他的脑海中烙下了印记，三十年后他勇敢地抗议日本再次对中国实施的侵略。早在1933年，他就明确预言日本侵略中国将要付出的社会和经济的沉重代价，他说：“日本糊涂了，失却了金钱，在满洲花费了二百亿，二十年内，中国将会收回满洲——吸纳日本所有正在做的一切。日本将会失去满洲……军阀愚蠢至极，他们看不到这个未来的景象。他们对政治或经济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谴责发动战争的内阁首相，“试图扮演墨索里尼的角色”。

这类对军国主义的批评使他不止一次陷于困境。1933年，仅因为出版反战诗歌，他就至少三次被警察拘留和审讯，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穷凶极恶的警察阻止任何像贺川这样的人的反战行为。基督徒和

共产主义者如果抗议就会被监禁。贺川之所以能够避免长期被监禁，很可能因为如果监禁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日本人士，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会严重伤害军事统治者的形象。

尽管贺川在日本受到压制，但在 1934 年他设法在日军占领的一所上海基督教堂里向中国人民作公开道歉。他说：“我个人对我的国家向你们所做的一切表示遗憾。”当他成年时，他对战争的反对来自于基督教教义。他视战争为背叛人类和上帝的罪行。“整个世界的军国主义者不理解圣灵。他们只有军事侵略和殖民主义的野心。当我们侵略他国领土时，我们其实是在侵略上帝之国。”在贺川看来，侵略和殖民主义使许多无辜的人丧生。他认为，能够摆脱这条死亡之路的唯一途径是爱、友爱，为穷人谋求公正并将引导人们走向神之国。

我希望所有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能思考贺川的言行以及他的言行背后的价值。他对和平的预言在今天依然如一百年前那样重要，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样真实。他反对暴力的行动在今天也是先知行为，如他预言日本将因军事暴力而毁灭一样。他全心全意地支持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这是他神学的政治体现。

20 世纪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战争、种族屠杀以及政治迫害，证明他对国际亲善的呼吁比以往更紧迫。虽然人类通过和平的战后重建、贸易、条约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已经在国际亲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我们仍面临暴力的威胁。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的祖国——美国，总是以战争和暴力威胁作为外交手段，最后带来灾难——就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

如伟大的印度领袖甘地一样，贺川也是个受西方观念影响的亚洲国际主义者，而且，像甘地一样，他将这些观念转变成新理念，对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人们认为甘地对伟大的美国民权领导人马丁·路德·金有很深的影响）。贺川皈依了基督教，并让这个宗教适应他独特的日本经验，让他在西方基督徒面前展示了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新方式。例如，他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对美国新教诸多教派的相互竞争和隔膜提出质疑。他以一个基督徒和亚洲人的立场，严厉批评美国基督徒的种族歧视，并且，对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在财富分配方面不适当的做法感到迷惑。

贺川改善人类生活的计划莫基于他的基督教信念，这在他长期坚持不懈地支持合作运动的努力中看得最清楚。贺川在日本组织了合作社，而且，他出版的著作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在其他国家所作的演讲对这些国家的合作社领导人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精神遗产继续影响着日本蓬勃发展的合作运动，这一运动在经济领域已有上百万成员，他们长期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

我衷心希望中国读者能从这本传记中获得见识和快乐，如我写这本书一

样。我希望它能帮助中国人和日本人和谐相处,更好地理解对方。我希望它也将激励中国人为解除贫穷和创造社会平等即贺川所称的“友爱经济”而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以贺川为榜样,尽最大努力将和平带向世界。最后,我希望他们在为这些目标而努力的同时,也能走在灵命丰盛的道路。

罗伯特·施尔德根(Robert Schildge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2008年2月

致 谢

写作这本书时，有很多人主动向我提供帮助并鼓励我，我感谢他们，但由于篇幅所限，此处无法一一列名。不过，我首先要感谢纪念贺川丰彦百年诞辰美国委员会提供的研究与写作资助（资助主要来自 Marjorie Barker F. D. B. Charity），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我很大的自由，允许我如实描述贺川丰彦一生中有争议的一些方面，而不是像早期那些片面的赞美性传记。

贺川丰彦的女儿梅子牧师给予了特殊的帮助，在我的采访中她提供了真实的忆述和家庭资料。George Yasukochi 耐心通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修改建议。Frank Omi 牧师翻译了一些日文资料，这对理解贺川丰彦很有帮助。Andrew Kuroda 帮助搜集不少资料和政府文件。Morris Lippman、Robert Neptune 和 Emil Sekerak 帮助阐释了贺川对于美国合作运动的影响，Thomas Grubbs 阐释了贺川对美国基督教会影响，Koji Murata 和 David Tatsuno 阐释了贺川对日籍美国人的影响。

部落族解放中心的 Robert Stieber 牧师提供了贺川丰彦与日本部落族之间关系的重要背景资料。德文版贺川丰彦自传的作者 Carl Van Drey，给我补充了许多在美国得不到的资料。许多基本的参考资料取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联合神学研究院（GTU，伯克利）以及旧金山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的合作。

我也感激古屋安雄，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我曾向他表露过能否胜任阐释贺川复杂一生的疑问，他给了我鼓励和信心。二十五年前古屋写过一篇关于贺川的文章，他对当时没有一本批评性的贺川传记表示遗憾。也许这本书能部分弥补这个遗憾，并引发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桥本秀雄牧师无私地帮我搜集和分析资

料,与我分享他的个人经验,给我热情的鼓励,在此,我要向他致以最深的谢忱和敬意。

这么多人不惜时间与精力帮我完成这本书,正是基督教“贺川精神”的生动例证。

罗伯特·施尔德根

奥伯林,俄亥俄

1988年4月13日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中文版序	(1)
致谢	(4)
导论:甘地—史怀哲—贺川丰彦	(1)
第一章 神秘的叛逆者	(6)
第二章 理念付诸行动	(19)
第三章 走进贫民窟	(37)
第四章 美国间奏曲	(57)
第五章 为劳工而奋斗	(65)
第六章 农民和部落民	(89)
第七章 国内的改革家、国外的大使	(105)
第八章 合作社专家给美国的信息	(127)
第九章 走向战争	(152)
第十章 战争中的和平主义者	(175)
第十一章 重建和忏悔	(190)
第十二章 缔造和平的人	(212)
结语:贺川丰彦与当代社会	(229)
贺川丰彦年谱简编	(235)
贺川丰彦与中国(译后记)	(241)

导论：甘地—史怀哲—贺川丰彦

1909年的平安夜，一个很聪慧、年方二十一岁的学生把一些书和衣服装进一个竹箱子，推着车子一路跋涉，来到神户市新川区一个有名的贫民窟。这个瘦弱的年轻人住进一座破旧的水泥房子，里面有两个黑暗的小房间、一个公共厕所、一个水池和一个穷人公用的厨房。这些穷人包括拾破烂的、拉皮条的、妓女、车夫以及慢性病患者、失业者。

这个年轻人最初的室友中，一个是患有营养不良和严重皮炎的酒鬼，一个是梅毒病人，一个是从监狱出来的杀人犯。这个地方曾一度没有人住，因为最初的住户被谋杀，并有传言说其鬼魂一直潜伏在此。邪恶的鬼魂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个狭窄的住处，它还经常出现在那个杀人犯的梦里。每当杀人犯梦见所杀之人的鬼魂时，这个年轻学生必须紧紧抓住杀人犯的手才能使他平静下来。

这就是贺川丰彦事业的奇异开端，他由此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改革家和宗教领袖，他或许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闻名世界、令人景仰的日本著名人物。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皈依者，贺川丰彦是少有的而且决心完全按照基督旨意去做的基督徒之一。他将自己献给了穷人，对穷人倾其所有，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感情上。他在贫民窟里生活，冒着损害健康的危险，保护、照料贫民，向贫民传授知识布道，而那时，他正忍受着眼疾的痛苦（沙眼，这种病折磨他一生），也承受着肺结核病复发的风险，在他进贫民窟前，肺结核几乎两度扼杀他的生命。

他被审讯过、被打过、被抢劫过、被持刀的歹徒恐吓过。当他把最后一件衣服送给穷人后，他不得不穿上从一个穷邻居家借来的一件妇女和服。他依然大无畏地、不可战胜地坚持着，即使是在让人皈依一种新宗教的时候。那些曾认为他患有精神病的人开始相信他有着超自然的力量，那些曾取笑他的人开始称他为“先生”——一个专用于称呼教师的日文词，比该词对应的英文更具尊敬之意。

贺川丰彦，一个在西方极具魔力的名字，曾经博得人们像对马丁·路德和

特里萨嬷嬷一样的尊敬。和他们一样，这个日本牧师被看做是无私奉献穷人、极度渴望社会公正与创造和平的基督徒的典范。实际上，他曾被称为“日本的甘地”、“日本的史怀哲”、“日本的圣方济”，或者更应该说他被推崇为“日本的圣徒”。他也被称为“基督的武士”，一个德国作家用流行的日尔曼语称他为“基督徒骑士”的榜样。^① 1940年，他因被怀疑出版了泄露日本军事秘密的文章而被投进监狱，《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以“日本的甘地被捕”为标题予以报道。^②

他的生活和著作都被载入史册，这些著作有着吸引眼球的标题，如《三位巨人：贺川—甘地—史怀哲》(*Three Trumpets Sound: Kagawa—Gandhi—Schweitzer*)^③以及《亚洲走向何处?》(*Whither Asia?*)^④等。同时，数百篇各种语言的文章都讲述了他作为穷人的牧师和社会行动家所从事的辛勤活动。他的大部分散文、小说和诗被翻译成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捷克语、汉语、印度语、希伯来语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语等等。^⑤ 人们可以经常在美国和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上阅读到这些译著。单单在1936年，就有75万多人听了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演讲。在重新评价贺川丰彦的小说《一粒麦子》时，著名的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兹恩(Alfred Kazin)写道：

贺川丰彦是今天东方伟大的基督徒领袖，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把自己奉献给自己的祖国，他像约翰·班扬和托尔斯泰一样利用了小说。有意思的是，和17世纪英国的《天路历程》、19世纪晚期俄国的《复活》相比，贺川丰彦的《一粒麦子》在日本取得了更大的成功。^⑥

贺川丰彦的工作并没有仅限于自己的祖国。他的演讲、文章所体现的反战思想，以及他仅仅15岁时就拒绝参加学校军训的和平主义行动，都深深感动着西方的和平主义行动家。然而，二战后，当日本报纸指责他屈服于日本政府并

① Gerhard Rosenkranz, *Flammendes Herz in Gottes Hand, von der Christlichen Ritterschaft des Dr. Kagawa Toyohiko* (Stuttgart: Evangelische Missionsverlag, 1948).

② *New York Times*, 5 September 1940, p. 5.

③ Allan A. Hunter, *Three Trumpets Sound: Kagawa—Gandhi—Schweitzer*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39).

④ Kenneth Saunders, *Whither A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⑤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79), pp. 90—91.

⑥ Alfred Kazin, "Pilgrims of Japa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9 February 1936, p. 6.

与“敌人”合作时，许多人开始对他不再那么崇拜。^① 而这些报道也让他在1955年虽获诺贝尔奖提名却最终落选。

这些都是贺川最具魅力而且复杂的现代生活的一些写照。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无数荣誉的先知，但是，他闯入国家名人的道路或许是他漫漫人生中最耐人寻味的章节。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黄金时代，贺川集特里萨嬷嬷、厄普顿·辛可莱(Upton Sinclair, 美国著名作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 美国社会改良家、和平运动领袖)的优点于一身，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精力充沛、纪律严明的人。几乎与此同时，他成为贫民窟的牧师、畅销小说作家、开辟道路的社会学家、日本劳工运动的领袖、农民以及消费合作社的组织者。

贺川作为1919年成立的关西劳动同盟的主席，在1922年领导了神户三万造船工人的示威游行，以抗议川崎和三菱两家公司所采取的政策，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因此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注意。仅仅领导罢工游行，或为无依无靠的人争取权益，发表讲演，这些并不足以发挥贺川的才能，他也写歌来激发工人罢工的热情，还亲自编辑劳动同盟的报纸。

那时，左派正在煽动工人以暴力争取权益，贺川倡导的和平主义与城市劳工运动格格不入，他只好又把精力转向乡村贫民，帮助建立了日本农会，将许多方面都比城市无产阶级更苦的小农阶级组织起来。他建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其中，沢山有一个合作社最后成为年赚百万美元的大公司。他把和平主义留给了日本合作运动，如今，这种运动是日本社会中强烈呼吁和平的主要声音之一。

尽管政府因为工会活动将他投进了监狱，但他的组织能力和声誉却让他在1923年毁灭性的东京大地震后的救济工作中取得了领导地位。二战以前，贺川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分别于1924年、1931年、1935年和1941年前往美国，并访问了许多亚洲和欧洲国家。这种国际形象和他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使人们相信他可能会成为战后新政府的首相，而他也继续凭借这种声誉扶持日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建。他支持一些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提出了许多使日本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民主化国家的改革措施。

他那信仰与社会行为相结合的神学思想，以及他的复杂生活所揭示的近代日本诸多问题的事实，是我们今天重新评价贺川丰彦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贺川丰彦曾经是一个传记作者笔下的受害者，这个作者将他描写成一个没有

^① Barnard Rubin, "Under Christian Guise, This Jap Fostered War", *Stars and Stripes*, Pacific edition, 20 December 1945, p. 2. 这是最早的一篇指控贺川与日本政府合作以及与极右军国主义爱国大众党领袖儿玉士夫牵连的文章，儿玉后来被宣判为战犯。

缺点、非常完美的圣人，以至于最终他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缺点让人们对他不再崇拜。由于过分简单化，最崇拜贺川的那些人缩减了他的成就。人们尊奉他是上帝挑选出来专为日本贫苦人民背负十字架的圣徒，但否认了他所背负的另外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复杂而且经常矛盾和痛苦的人格。

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让他人生变得黑暗战争引发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各项改革。战后日本宪法的制定者以及占领军实现了年迈的贺川一生最珍视的梦想。在他领导工会对抗政府二十五年后，工会组织实现了完全自由。他倡导的妇女参政得到了保证。大量的土地与农业改革制度已颁布，而且大财阀的专横减少了，尽管一些人认为这些改革不充分或不够长远。宗教自由得到了保证，著名的新宪法第九条——禁止使用战争作为政治工具成为日本的法令。

战前的改革家很快因为战后的纷繁事件而退出历史舞台。贺川逝世十年后，他的一个同事也是贺川的传记作者黑田四郎在1970年悲叹道：

贺川鼎鼎有名。作为和他一起工作五年的同事，在我游遍日本所遇到过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不知道贺川是谁。但如今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贺川的名字。^①

但是，如果忽略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惊人的幽默、细心、深邃的眼睛和怪癖，我们就会把他刻画成一个极端严肃的人。在论及巨大的原子能问题时，他会说：“我们必须从宗教立场来了解原子学。我对于原子的奇妙结构很感兴趣。”^②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厦时，这个矮壮、穿着破旧黑外套的人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斜视着大厦，并评论说：“这个大厦太方方正正了，没有任何特征表明联合国应该代表什么。”^③

他喜欢用漫画来阐释自己的一些作品，包括讽刺日本的环境污染。他是个有成就的书法家，喜欢向孩子炫耀他的技巧。贺川是个写作狂，他患有痔疮，不得不延长坐在马桶上的时间，他就利用这个间隙口述了不少通信。在家里，他

^① Shiro Kuroda, *Ningen Kagawa Toyohiko* (Toyohiko Kagawa the Man) (Tokyo: Kirisuto Shimbunsha, 1970), p. 9, trans. Yuzo Oto, "Kagawa Toyohiko: A Pacifist?" in Nobuya Bamba and John F. Howes, *Pacifism in Japan: The Christian and Socialist Tradit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78), p. 169. 关于贺川在日本声誉的讨论，见 Yasuo Furuya, "Toyohiko Kagawa (1888—1960):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H. T. Ker, ed., *Sons of the Prophe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92—204.

^② "Kagawa Arrives on Revival Tour", *New York Times*, 15 July 1950, p. 14.

^③ 同上。

坚持家长制，孩子们秉承他的节俭之风，很少买新衣服。由于他对于妇女解放的炽热信念，他劝妻子写了一本书。他家房子二楼摆满了很重的书，不得不加厚地板以防断裂。有时候，他以一种令人烦躁而且走调的嗓门唱他喜欢的赞美诗。^①

没有人会料到这样一个喜欢沉思的脆弱的人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但贺川丰彦就是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人物，他屡次战胜致命性的疾病或虎口脱险，自己也承认这是个“神迹”。贺川称自己是个“上帝的赌徒”，他践行了《圣经》上的训谕：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获得更丰盛的生命。他穿越了死亡线并重生成为一个英雄。他那引人注目的奋斗细节与奋斗结果，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保持他那样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贺川丰彦诞辰一百周年（1988年）时所要探索的。

^① 这些以及其他大量的贺川个人在家庭的生活细节，均来自1986—1987年作者对他女儿的一系列采访。

第一章 神秘的叛逆者

像耶稣一样服务穷人而闻名世界的这个人，并非生在穷人家庭，也没有被遗弃在马厩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政治家，是一位富裕日本武士家族的继承者，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豪宅里度过的。但逆境来临之时，这个家族遭受重创。自古磨难出英才——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去忍受痛苦，感受别人的痛苦。他神秘而又实际，在同一天，他既注意到一位可怜的乞丐脏兮兮的细节，同时又为自己在复杂的人生情境中所遇到的耶稣基督写出令人着迷的诗句。^①

在理解贺川之前，我们须回顾一下他不同寻常的童年、他的祖先以及他出生时的社会矛盾。让西方人感到有点疑惑的是他不仅不是贺川家族的嫡生子，而且还是一个私生子。不过，在上流家庭还有一些特权的时候，他也享受过。

贺川的父亲传次郎于1847年3月17日生于靠近四国岛东端的阿波。四国岛是日本四个主要岛中最小的一个，这些群岛从热带地区一直延伸到冻土地带。四国岛被西南方蜿蜒起伏的最大的本州岛环抱着，内海海峡将它与本州岛

① 第一本英文版贺川传记是 William Axling, *Kagaw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2)。两本写于战后的英文版传记是 Charlie May Simon 的 *A Seed Shall Serve: the Story of Toyohiko Kagawa, Spiritual Leader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E. P. Dutton, 1958) 和 Cyril J. Davey 的 *Kagawa of Japan*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60)。

关于贺川一生，最近还出版了四本优秀的英文著作，最引人入胜的一本是 George B. Bikle, Jr., *The New Jerusalem: Aspects of Utopianism in the Thought of Kagawa Toyohiko* (Tucson,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6)。该书关于贺川政治思想的研究，对理解贺川的精神成长及他与日本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还有三本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也很有参考价值，分别是 Arthur C. Knudten, *Toyohiko Kagawa and Some Soci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Tendencies in Modern Japa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46); Willie Tesunetaka Nagai, *A Christian Labor Leader: Kagawa Toyohiko (1888—1960)*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76); Ken Nishimura, *The Idea of Redemption in the Writings of Toyohiko Kagawa* (Emory University, 1966)。

标准的日文传记有横山春一「贺川豊彦傳」(新約書房、昭和25年)，其他比较有价值的传记有隅谷三喜男「贺川豊彦」(日本基督教団出版局、1966年)、武藤富男編「百三人の贺川伝」(キリスト新聞社、1960年)、武藤富男「贺川豊彦」(キリスト新聞社、1981年)。

分开了。米酒制造商柳五郎有九个儿子，传次郎是其中一个。根据日本收养习俗，他改姓贺川。在男性支配的社会经常强调家族的延续，没有嫡男的宗族为了传承血脉一般会收养义子，让他更姓改名，并把一位合适的女儿婚配给他。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传次郎身上，他15岁时被当地一个有名的武士家族首领贺川盛平收养。以西方观念来理解，贺川这一姓氏代表着高贵，是一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地主，属于上流家庭。“贺川”的真正意思是“幸福河”，该姓起源于环绕着他们的家且离大海仅有十二英里远的吉野川。元禄时代（1688—1703），在稳固的封建体制下，这个家族的家长成为十九个村庄的头领。在沿河平原上，他们种植大米、水果，养蚕，且是最早栽培靛青（当地一种主要的商品作物）的家族之一。丰彦自己最终被确定为这个家族的第十四代继承人。因为收养关系，传次郎更名为纯一，并很快与贺川的一个女儿 Michi 结婚，Michi 比传次郎小七岁。另外一个可以说明贺川家族高贵的事实是，收养义子是由阿波的大名建议进行的。

与这种固守传统习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贺川的其他方面。他是日本从封建时代一跃而进入“近代”世界所经历的那种狂乱时期的产物。17世纪中期，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驱逐所有外国人，禁止日本国民到国外游历，禁止从西方进口书籍，限制与中国交往。日本成了武士和德川幕府将军们的神秘领土。

这意味着日本民族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重大技术革新和政治发展切断了联络。二百年后，美国用“炮舰外交”打开日本国门，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于1854年率领舰队驶抵江户湾，日本才开始变化。西方国家的强大使日本人民认识到他们必须马上适应这种世界变化，否则就被征服。因此，日本开始迫切地将西方路线与本国的传统主义相结合，而这一点也常让西方人感到迷惑。

民众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和要求接受新观念的愿望日益上升，最终导致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场改革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但是，日本的这种体制并非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天皇被认为是上帝并拥有神权。在日本，君主政体与通向民主之路的立宪制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天皇充当着固定船舶的“锚”，与过去相联，象征着安定统一，其背后有从法国和德国借来的民族主义和强制性的兵役制度支持。

在从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急速转变的过程中，有太多张力出现，并且成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向极权主义的因素。身着长袍，剑别在腰带上，头发盘成髻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武士，这代人被带着枪和身着西式制服的士兵以及驾驭着辉煌炮舰的水兵取代了。在第二代人的后期，这个把所有侵略者都驱逐出境的孤岛已开始着手自己的帝国主义事业，占